

# 歌德论现代性

贺 骥

**摘 要:** 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探讨了歌德对现代性的理解及其现代性批判。歌德认为,现代指的是中世纪之后的机器大工业时代,他将这个新时代的特性概括为“快速”,快速指的是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现代人在竞争的压力下急于求成。他认为,快速的时代精神是由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造成的,不受限制的科技进步和迅速的工业化不仅破坏了大自然,而且损毁了人的精神,导致了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普及和精英文化的衰落。凭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本文还揭示了歌德的现代性批判对后世的文化悲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影响。通过对歌德的现代性观念的发掘和对其现代性批判进行思想史上的梳理,本文填补了“现代性”概念史和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空白。

**关键词:** 歌德; 现代性; 工业化; 快速; 慢文化

[中图分类号] I109.9

DOI: 10.12002/j.bisu.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 (2017) 02-0083-10

## 一、现代性概念及其内涵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何谓“现代”? 现代指的是中世纪(476—1500)之后的“新时代及其时代精神”。何谓“现代性”? 现代性(Modernität)指的是“现代的特性”。(Droskowski, 1980: 1806~1807)西方现代思想家们对“现代性”作出了各自的解释和定义。

夏多布里昂在《墓畔回忆录》(1815)中贬义地使用了“现代性”一词,用它来指“现代生活”的平淡乏味,与之相对立的是大自然的永恒崇高和中世纪过去的辉煌。(卡林内斯库, 2015: 44)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一文中揭示了现代生活频繁的变化,将“现代性”定义为“过渡、短暂、偶然”。(波德莱尔, 2002: 424)尼采在《瓦格纳事件》(1888)一书中将“现代性”确定为“颓废”,而颓废的症结在于权力意志的衰弱:“贫乏的生命、走向毁灭的意志和极度的疲惫。”(Nietzsche, 1988: 12)本雅明在《拱廊著作》(1927—1940)中将现代性解释成快速变化的城市生活给现代人带来的接连不断的“震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外国文学重要思潮研究”(项目编号: 14CAC07)的阶段性成果。

惊体验”和快速反应机制。(王才勇, 2012: 54)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尔在《总动员》(1930)一文中褒义地使用“现代性”一词,他将现代性确定为“技术统治”和运用技术手段与军事组织对社会的“全面动员”。(Böttcher, 1983: 567)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乃是“主体性形而上学”(即主体哲学),其根源在于“技术座架”,即现代技术对大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奴役。(陈嘉明, 2001: 171~187)

厦门大学陈嘉明教授对现代性观念作了总结,他认为“现代性”是在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待现实的理性主义态度,其内涵包括:主体性和工具理性、个人主义和自由观念、世俗化和物质主义、实利主义经济观、进步观念、工业文明、技术统治、控制自然和他者以及透明的社会关系。(陈嘉明, 2001: 3~26)

陈嘉明教授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和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等书均对“现代性”概念的来龙去脉作了细致的分析,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但他们都没有指出歌德对“现代性”概念的贡献。本文运用文本细读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力图探讨歌德对“现代性”概念的明确定义,并揭示其现代性批判对尼采等人的文化悲观主义和对维利里奥的技术悲观主义的启发和影响。

## 二、歌德论现代性:现代性即快速

歌德是最早揭示和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歌德是一位具有持久创造力的伟大诗人和富于洞察力与前瞻性的非体系思想家,其作品与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1886)一书中将歌德誉为永不过时的“经典作家”和突破了民族与时代限制的文化巨人:“歌德属于比民族文学更高的文学类型,因此就生活、新奇、过时等方面而言,他都不属于他的民族。他曾经为少数人活着,现在仍然为少数人活着……歌德,不仅是一个好人、伟人,而且是一种文化。”(尼采, 2011: 407)在歌德留给后世的文化富矿中,我们可以发掘出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观念,其中包括他的“现代性”观念。

歌德生活在德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和欧洲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当德国的工业化开始起步时,歌德就已经觉察到了正在到来的新时代的特性。1825年6月6日,他在致作曲家策尔特的信中将新时代的特性概括为“快速”(Schnelligkeit):“我的好友,现在一切都走向了极端,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地

自我超越,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亦如此。人们不再了解自己了,不再熟悉他们所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了,不再熟知他们所加工的材料了……年轻人被过早地唤起,然后被时代的漩流卷走。世人皆赞赏和追求财富与快速。整个文明世界都企图拥有铁路、邮政快件、轮船和一切可能的交通与通讯快捷工具,以便超越自我、掌握过多的知识和保持中等水平。这也是普及教育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使公众普遍拥有一种平庸的文化……如果我们尽可能地坚持传统的精英教育观念,那么我们会和少数人一起成为一个即将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遗民。”(Goethe, 1976: 146~147)

在1825年12月26日致法国公使莱因哈德伯爵的信中,歌德抱怨魏玛公国首相弗里德里希·封·米勒因“工作繁忙和快速行动”而忘记了朋友,并指出“米勒快速的(veloziferisch)工作作风符合快速的时代精神。”(Goethe, 1976: 165)歌德将新的时代精神判定为“快速”。“快速”指的是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指的是现代人在竞争的压力下急于求成:“快速进展以达到目的,而不考虑手段。”(Goethe, 1963: 440)

“快速的”时代精神首先是由工业革命塑造的。地理大发现、科技进步和蒸汽机的发明催生了欧洲工业革命。德国在18世纪末开始从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型。在1795年8月29日的信中,歌德向席勒展示了魏玛公国工业化的萌芽:“到处都在从手工业向机器工业(Maschinenwerk)过渡,伊尔梅瑙矿山虽然很偏僻,但它与世界的交通比某些平原小城更便捷。”(Goethe, 1988: 201)在1829年11月13日致策尔特的信中,歌德赞扬科技进步促进了魏玛公国矿业和盐业的发展:“在此我们要祝贺进步,五十年来科学与技术已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因此我们敢于向地下1200英尺深处钻探。”(Goethe, 1976: 355)工业化增加了社会财富,但同时又导致了手工业者破产,并且加剧了社会竞争。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1829)一书中,歌德借小说人物苏珊娜之口说道:“迅猛发展的机器工业使我感到痛苦与恐惧,它像一场大雷雨滚滚而来,慢慢地,慢慢地到来;但这场雷暴的方向已定,它必将来临,必将击中林木……我清楚地知道,附近就有人打算自己安装机器,抢走大家的饭碗。”(Goethe, 1977: 429~430)工业化最明显的后果就是造成了“世界的快速变化”和现代人的“劳碌与繁忙”(Polypragmosyne)(Goethe, 1963: 542)。

“快速的”时代精神的另一个塑造者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大革命成果的受益者拿破仑。歌德认为,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概念纯属“无法无天”,其“人人平等”的原则则是幻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平等乃是表明不平等的第一手

段。”（Goethe, 1963: 380）法国大革命为了实现抽象的“自由平等”原则，急躁“冒进”“抢掠烧杀”，进行“暴力颠覆”，结果“破坏的好事物和赢得的一样多”（艾克曼，2008：87）<sup>①</sup>。法国大革命的快速跃进违背了“渐变”的自然规律和“渐进”（allmähliche Entwicklung）的历史规律，为追求速度的现代世界开了一个坏头。

大革命成果的巩固者拿破仑的“快速政治”继续塑造“快速的”时代精神。拿破仑于1799年11月上台后，建立了一个高速运转的官僚警察军事国家机器。他推行“快速政治”，即采用各种手段迅速达到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在1829年4月7日和艾克曼的谈话中，歌德盛赞拿破仑的政治军事才能和迅速的决断力：“他永远坚定不移，永远头脑清醒，永远当机立断。他永远如鱼得水，能应付任何的情势和环境，就像胡美尔既能演奏慢板也能演奏快板（Allegro）。”（艾克曼，2008：228）拿破仑的成功秘诀在于“活力与速度”，他首倡了现代的运动战：“我们必须首先通过战士们的飞毛腿来取胜。”（Osten, 1999: 4）拿破仑不仅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带给了被征服的欧洲国家，而且把快节奏强加给了欧洲，使它成为现代的生活情感。

歌德对现代性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赞扬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国际交往的便捷；另一方面他又对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表示忧虑。在1828年8月8日致卡莱尔的信中，歌德指出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跨地区和跨国的邮政、交通和新闻出版业的繁荣，从而使国际交往日益便捷，世界文学的产生成为可能：“通过邮政快件和轮船，通过日报、周刊和月刊，各民族逐渐相互接近，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特别关注这种相互的交流，我们可以越来越自由地利用这种业已开始的国际交往！”（Goethe, 1887—1919: 257）

但歌德更加关注“快速的”现代生活的消极面。他认为“快速”在总体上是恶性的、野蛮的，它体现了魔鬼的破坏性，为此他创造了一个新词“Velozifer”（恶性的快速）（Goethe, 1977: 632）。Velozifer是一个合成词，它由拉丁语 Velocitas（迅速）与 Lucifer（魔鬼）复合而成，由此凸显了“快速”的恶魔性。在1825年11月底致普鲁士官员尼柯罗维乌斯（Georg Nicolovius, 1767—1839）的信中，歌德抱怨新时代万事皆快，他觉得急于求成的新时代只能造就一种普及性的大众文化，而创造不出“淡泊宁静的教派”严肃的精英文化。“我不得不认为我们这个不等果实成熟就去收获的时代的最大灾难就是：人们寅吃卯粮，虚度时光，所得往往仅够糊口，做不出什么伟大成就。我们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日报，一位优秀人物还可以多订一两份报纸。由于报业的兴旺，每个

<sup>①</sup> 杨武能译文：破坏的和赢得的一样多。



人所做、所从事、所创作的一切，甚至他打算要做的一切，都被公诸于众。没有人能保留个人的痛苦与欢乐，苦与乐都成了公众的消遣；新闻于是迅速传播，从一家到另一家，从一城到另一城，从一国到另一国，最后从一洲到另一洲，一切皆快速。”（Goethe, 1976: 159）

歌德厌恶消遣性和商业性的现代快速文化（Beschleunigungskultur），因为急功近利的现代人缺乏“认真负责精神”，他们“粗制滥造”，“直至终老都在制造一些半吊子的东西”（艾克曼，2008：83），这些半吊子产品降低了受众的文化水准，败坏了高雅的审美趣味。与之相反，歌德坚持逐渐积淀的、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的慢速文化（Ritardando-Kultur）。他在致尼柯罗维乌斯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不能去扑灭蒸汽机车，同理，在道德上消灭下述现象也是不可能的：商业的活跃，纸币的流行，为了还债而增加债务，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现代年轻人必须面对的强大现实环境。谁若是天生就具有节制而宁静的性格，既不会向世界提出迫切的过分要求，也不能忍受世界对他的过分要求，谁就是有福之人。”（Goethe, 1976: 159~160）斯多葛主义的淡泊宁静就是歌德对付现代躁狂症的良方。在1813年1月25日致莱因哈德伯爵的信中，歌德赞扬以维兰德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充满了对高雅艺术的热情，他们潜心于文学艺术，不断提高审美能力，创造了一种高级文化：“精神上的沉静（Geistesruhe）与行动在他身上达到了美妙的平衡，就这样，他以最大的从容和恬淡对民族的精神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Goethe, 1965: 224~225）

歌德认为现代人患上了急于求成而不愿意回忆和反思过去的匆忙症（Eilkrankheit）。他在《格言与反思》（1829）中写道：“匆忙和狂妄乃是危险的恶魔，它们会使最有能力的人感到力不从心，会使所有的效果尽失，会使自由的进步停顿。”（Goethe, 1963: 424）他认为，匆忙症的形成在社会历史方面应归因于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同样重要的是，它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病因。

第一种有害的思想倾向就是康德的二元论先验哲学。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环节。时间和空间是感性的两种先天形式，它们加之于感觉材料就产生了经验对象；知性（Verstand）乃是意识的主动性，先天的知性范畴把经验直观纳入到范畴的框架中，使它具有规律性的联系从而成为知识；理性则用理念来整理统一知性的知识。（全增嘏，1985：56~79）康德的知性（即意识或先验统觉）造成了主客体的分离与对立，夸大了主体意识的作用。歌德肯定了康德对人认识能力的洞察：“康德提出的先天知识和先天综合判断也很合我的意。”（Goethe, 1975: 27）但他对康德提出的主客体二元

对立非常不满。作为一位泛神论者，他认为世界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主体与客体是相互联系的：“客体中的某种未知规律符合主体中相应的未知规律。主体中的一切，在客体之中并大于客体。客体中的一切，在主体之中并大于主体。”（Goethe, 1963: 436）歌德认为不受限制的知性会使大自然备受“折磨”，康德的意识哲学会导致人对大自然的不敬和快速掠夺：“抽象概念和狂妄自大终将酿成可怕的灾难。”（Goethe, 1963: 417）

第二种有害的思想倾向就是知性操之过急和匆忙下结论，它与康德的意识哲学紧密相关。急进的知性会加快科研的速度，会使研究者从现象迅速走向解释，从而得出错误的理论：“理论通常是急躁的知性匆忙下结论的结果，知性喜欢尽快摆脱现象，因此它经常用印象、概念和空话来代替现象。”（Goethe, 1963: 440）与急躁的抽象思维相反，歌德运用的是面向现象和从不脱离现象的“具体思维”（*gegenständliches Denken*），即通过感性直观、科学实验和纯粹直观（即理智直观），获得对现象的规律性认识：“思维比求知有趣，但不如直观。对尘世事物的普通直观和正确认识是普通人健全理智的一份遗产；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纯粹直观则很罕见。”（Goethe, 1963: 398）

第三种有害的思想倾向就是现代教育所主张的学科专业化和功利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导致了知识大爆炸，现代人成为一位博学多能的全才似乎已不太可能，而工业化时代精细的劳动分工又要求现代人只精通一门学科或技术以成为专才。在《漫游年代》一书中，歌德借小说人物蒙坦之口说道：“现在是片面的时代；谁明白了这一点并在掌握专门技能的意义上为自己和为他人工作，谁就是有福者。”（Goethe, 1977: 37）为了获得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在未来职场上胜出，大学生们整日忙于专业学习。在1797年3月28日致克内贝尔的信中，歌德表达了他对急功近利的专业教育的忧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种过度的繁忙正在加快科研事业，年轻人则迅速汲取他们所能获得的知识。”（Goethe, 1988: 260~261）歌德在总体上倾向于通识教育，他希望受教育者掌握全面的、跨专业跨学科的知识，同时学会一门谋生的职业。他的教育理想乃是亚历山大·封·洪堡那样的全才：“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最杰出的人物本身就是一座科学院，当代的洪堡亦如此。”（Goethe, 1963: 424）

在快速的工业化时代，现代人不停地忙碌，在取得暂时成功的同时会感到身心疲惫和“焦虑”。（Goethe, 1978: 506）现代大工业的出现推进了城市化，城市人对效率和财富的追求导致了自私自利和人情冷漠。歌德哀叹道：“我们的食物和生活方式失去了纯真自然，我们的社会交往没有真正的爱和善意。”（艾克曼，2008: 179）在《格言与反思》中，歌德揭露了现代快速文化的不人道：“人

能创造出的最可怕的文化乃是一种信念,即他坚信他人从不关心他。”(Goethe, 1963: 539)

歌德怀念前现代有着历史连续性、像植物一样缓慢生长的慢速文化:“像种子在地下所度过的生根发芽期那样的时代,首先属于植物的生命进程。”

(Goethe, 1963: 393)歌德对神性自然充满着敬畏,他反对现代科技对自然的控制,反对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主张天人合一:“这是一件乐事:同时研究自然与人的自我,既不对自然施暴,也不对人的精神施暴,而是通过温和的相互影响使两者达到平衡。”(Goethe, 1963: 399)他希望知识精英能够脱离缺乏人文关怀的现代化大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为未来建立新的精英文化:“虔诚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淡泊宁静达到最高文化的一种手段。”(歌德, 1999: 292~293)

### 三、歌德的现代性观念对后世的影响

歌德的杰作《浮士德》(1808/1832)不仅是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而且是现代性(快速)的悲剧。浮士德是高要求的现代社会里的闪击战士,他在悲剧第一部《书斋》一场中就急不可耐,要快速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和迅速攫取各种利益。他咒骂前现代的慢速,甘愿受“快速”这个现代恶魔的驱使:“诅咒爱情的忘我痴迷! / 诅咒希望! 诅咒信仰! / 尤其要诅咒耐心!”<sup>②</sup>(歌德, 2003: 69)在魔鬼靡菲斯托的快速魔法的帮助下,浮士德拥有了快刀、快速爱情、快速飞行的皮袍、快钱(纸币)和快速杀人(烧死菲利门和巴乌希斯)。魔鬼认为浮士德精神就是急于求成的速度狂和利己主义:“命运曾赠与他一种精神, / 使他好高骛远, 桀骜不驯, / 他急于求成只顾往前闯, / 对人间的欢乐不问不闻。”<sup>③</sup>(歌德, 2003: 78)浮士德忘记过去,否定记忆,开了德国历史突然断裂的先河。

歌德是一位注重历史连续性(Folge)的作家,他在《宾根城的圣罗科节》(1814)一文中写道:“只要人类的生活具有连续性,它就会有某些价值。”(Goethe, 1979: 413)这种重视文化记忆和文化遗产的思想启发了哲学家克尔恺郭尔,他写下了一条关于回顾和反思历史的格言:“只有通过回顾过去才能理解生活,而只有放眼未来才能继续生活。”(Auel, 2012: 81)

<sup>②</sup> 杨武能译文:特别要诅咒忍耐谦让!

<sup>③</sup> 杨武能译文:他匆匆忙忙只顾往前闯, / 对人间的欢乐不问不闻。

机器大工业时代制造的快速文化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转瞬即逝的大众文化，歌德抵制这种低级的大众文化，他要求知识精英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和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和审美趣味，为未来创造一种有永恒价值的高级文化。他写道：“现代世界不值得我们为它工作，因为现代事物转瞬即逝。我们必须为过去和未来工作。对于过去，我们承认它的成就；为了未来，我们努力提高它的价值。”（Goethe, 1963: 378）在尼采生活的第二帝国时代，德国工业迅猛发展，城市化程度更高，产业工人人数剧增，金融资本业已形成，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帝国主义。在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尼采以歌德式的精神贵族姿态，阐述了他的文化悲观主义：“越往西方去，现代的动乱就越大……这种动乱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更高级的文化不再能产生它的成果；这就好像一个个季节互相接替得太快了。由于缺少安宁，我们的文明将慢慢在一种新的野蛮中结束。活动家，也就是说躁动不安的人，任何时候都没有更具有价值过。所以，大量加强沉思成分属于你必须对人性进行的必要修正。”（尼采，2011: 155）

擅长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和小人物恐惧心理的小说家卡夫卡对文化巨人歌德充满了敬意，他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这位内心宁静的诗坛君王的“无限的依附性”。1912年6月至7月，他偕同布罗德访问了魏玛。他认为是“急躁”（Ungeduld）使现代人失去了幸福的精神家园：“急躁把人从天堂中赶了出来，并使他离天堂越来越远。”（Osten, 1999: 1）

在快速变动的工业社会，歌德非常向往古老东方的悠闲文化。他在《西东合集》（1819）中写道：“逃走吧，逃向纯净的东方，/去呼吸宗法社会的清新空气！/让爱情、美酒、歌唱陪伴你，/……东方是真主的属地，/西方是真主的属地！/北方和南方也都一样/安息在他宁静的手上。”（歌德，2015: 211~215）在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1827）中，歌德将中国誉为节制有度的、和谐宁静的“东方乐土”，表达了他中国式的寄兴林泉、陶情诗酒的“宁静之乐”（歌德，2015: 396~399）。受到歌德形态学影响的维特根斯坦同样欣赏悠闲的慢生活和慢文化，并为此写下了一句格言：“哲学家们见面时的问候语应当是：‘慢慢来！’”（Hosseini, 2007: 152）

歌德的人道主义和他对快速文化的批判还启发了维利里奥（Paul Virilio, 1932—）的速度学。维利里奥的文笔有时甚至带有歌德语言的印记，例如他在《运输工具》一文中写道：“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走向了极端，我们已感觉到了世界末日。”（Virilio, 1978: 43）和歌德一样，维利里奥也是一位技术悲观主义者，他认为技术的发明也就是事故的发明，与轮船一同发明出来的有海难，



与汽车一同发明出来的有交通事故,与电子媒介技术一同发明出来的有实时互动这颗电子炸弹。(庄鹏涛,2011:68)后工业时代电子信息媒介与实时时间创造出了一种同时性和即时性的感觉,这种感觉总是贬损等待和缓慢,它生成的是一种极速文化(Accelerated Culture)。(梅琼林,2007:17)信息技术的加速度暴政使“技术感知”替代了人类感知,最终导致物质、文化、美学和人类感知的消失。(阿米蒂奇,2014:218~238)

生活在后工业时代的德国诗人斯温·弗里德尔(Swen Friedel,1977— )非常厌倦当代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此处躁动不停,思想无法生长。”他在《人物》一诗中缅怀静以修身的慢文化宗师歌德:“铁桥上的男子,/悠游雅士,缓步如歌德,/与回家的车流不相宜,/也许他就是评判众生的/幕后掌权者。”(博松,2012:51)

#### 参考文献:

- [1] Auel H-H. *Gott am Kreuz* [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2.
- [2] Böttcher K & Geerdts H (Eds.). *Kurz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M]. Berlin: Volks und Wissen, 1983.
- [3] Droskowski G (Eds.). *Duden. Das Große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M]. Mannheim: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80.
- [4] Goethe J W v. *Werke Abt. IV, Bd. 44* [M]. Weimar: Böhlau, 1887—1919.
- [5] Goethe J W v. *Goethes Werke Bd. 12* [M]. Hamburg: Christian Wegner Verlag, 1963.
- [6] Goethe J W v. *Goethes Briefe Bd. 3* [M]. Hamburg: Christian Wegner Verlag, 1965.
- [7] Goethe J W v. *Goethes Werke Bd. 13* [M].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75.
- [8] Goethe J W v. *Goethes Briefe Bd. 4* [M].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76.
- [9] Goethe J W v. *Goethes Werke Bd. 8* [M].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77.
- [10] Goethe J W v. *Goethes Werke Bd. 9* [M].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78.
- [11] Goethe J W v. *Goethes Werke Bd. 10* [M].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79.
- [12] Goethe J W v. *Goethes Briefe Bd. 2* [M].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88.
- [13] Hossein M. *Wittgenstein und Weisheit*. [M]. Stuttgart: Verlag Kohlhammer, 2007.
- [14] Nietzsche F. *Der Fall Wagner* [M].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8.
- [15] Osten M. *Die beschleunigte Zeit* [Z]. [http://www.zeit.de/1999/35/199935.goethespecial\\_.xml](http://www.zeit.de/1999/35/199935.goethespecial_.xml), 1999-08-26.
- [16] Virilio P. *Fahren, Fahren, Fahren* [M]. Berlin: Merve Verlag, 1978.
- [17] 阿米蒂奇. 保罗·维利里奥简介 [J]. 文化研究, 2014 (3): 218~238.
- [18] 艾克曼. 歌德谈话录 [M]. 杨武能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8.

- 
- [19] 波德莱尔. 1846 年的沙龙 [M]. 郭宏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20] 陈嘉明等.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21] 歌德. 歌德文集第十四卷 [M]. 杨武能, 刘硕良主编. 张荣昌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22] 歌德. 浮士德 [M]. 杨武能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23] 歌德. 歌德精选集——迷娘曲 [M]. 杨武能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5.
- [24] 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M]. 顾爱彬, 李瑞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 [25] 梅琼林, 袁光锋. “用时间消灭空间”: 电子媒介时代的速度文化 [J]. 现代传播, 2007 (3): 17~21.
- [26] 尼采. 人性的, 太人性的 [M]. 杨恒达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27] 诺娜·博松等. 德语新锐诗人诗选 [J]. 贺骥译. 诗刊, 2012 (8): 48~53.
- [28] 全增嘏主编. 西方哲学史 (下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29] 王才勇. 现代性批判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2.
- [30] 庄鹏涛. 穿越技术的迷雾 [J]. 理论月刊, 2011 (6): 68~71.

收稿日期: 2016-09-29

作者信息: 贺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100732, 研究方向: 德语文学、文学理论和美学。  
电子邮箱: heji@cass.org.cn